

本期特稿

高端声音

把握基本国情 立足最大实际

青岛峰会开启上合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样令人振奋、催人奋进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九大依然郑重重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自觉、镇定从容、豪迈自信的政治远见、战略定力与使命担当。

辛 鸣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特指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就是说生产力水平是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标准。如果生产力水平不高，没有提升到现代化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难言跨越。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算是生产力发展超越了初级水平。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明确讲，“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段话后来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这实际上讲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特征，一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另一个是“上百年时间”。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实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飞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客观反映，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实意味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了某种跃进，意味着发展阶段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当下生产力水平的跃进尚未达到基本现代化的水平，这一时期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矛盾，并不是说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上的阶段的特征，不能因此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

关于对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与发展状况的评估，我们要讲两句话：一句是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了，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积累，某些方面的发展已经供大于求、甚至一骑绝尘；再一句是发展程度并没有很高，发展态势尚不够稳固，发展总量并没有绝对充裕，某些方面依然存在短缺、依然比较滞后。这两句话任何时候都要一块讲，不能只讲其中一句。

我们讲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主要是纵向比。诚然，今日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不仅与40年前、30年前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就是与20年前、10年前相比，甚至与5年前相比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整个世界发展进程来看，横向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飞跃，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偏下，依然是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生产能力”是不能与“生产力水平”直接画等号的。比如，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开始从传统的靠拼土地、拼资源、拼劳动力，向拼科技、拼质量、拼效益转变，但这种转变还处在起步阶段，新动能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挑起经济发展的重担，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还需要向高端化迈进，传统的生产方式还在很多地方存在，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决定了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充

分发展阶段。

再进一步看，主要矛盾中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生产力水平低。所以，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落后地区、农村的发展不充分，比如很多地方虽然已经摆脱贫困，但仅仅是刚刚跨过“贫困线”或“温饱线”，小康的基础尚不巩固，甚至东部发达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依然有发展不充分的现象，比如，高质量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依然是稀缺资源，高等级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基本上刚刚起步或者还没有起步，有的城市还有大量的“城中村”等等。如果说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我们是刚刚站在社会主义的“门槛上”，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只是站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门槛上”，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正确判断。脱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实践中就会吃苦头，历史上的急于求成曾留下深刻的教训，这样的教训不能再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提醒我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政策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足够的战略定力，一定不能被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不能发热、不能冒进，不能好大喜功。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竭力避免。反过来还应

展，加快发展，只不过这发展是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全面发展依然是有重点的发展，经济建设依然是发展的火车头，只是如果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保持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也走不远。

我们要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不容半点含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必须旗帜鲜明。尤其是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充分体现出来发扬光大。

我们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



航拍海南环岛高铁东线三亚段（新华社发）

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还体现在制度建设不够成熟、没有定型。而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也不会一蹴而就，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重申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判断，与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并不矛盾。“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长过程在当前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并且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又重新处于有利地位，让中国社会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对此，我们不仅不妄自菲薄，反而自信自豪。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取得这样的成就，更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努力奋斗。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要牢记

我们之所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定位，是因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自对发展阶段

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高涨与初级阶段的客观条件之间会形成巨大反差，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不仅不会随着物质成果的增加而增加，反而会因过高预期未达到而失落，让人民满意与高兴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比如，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这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尚未根本性解决，而随着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何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是我们新时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对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宁愿估计得更充分一点。毋庸讳言，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奇迹很多是在低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依靠辛勤的付出和巨大代价获得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的创新能力不强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中国社会现实生产力水平的一个缩影。

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自然就会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虽然说中国社会已经从“发展起来前”转变到了“发展起来后”的阶段，并不是说不需要发展了，不是说不再发展了，而是依然要继续发

展，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全面深化改革，向顽瘴痼疾开刀，对利益藩篱说不，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同时，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借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也要“顽固”一点，绝不能动摇。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我们，拥护我们。背离了基本路线，中国社会是不可能继续发展的，人民群众是不会答应我们的，我们就会被打倒。

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我们强调不能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并不是说就墨守成规、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要抓住时代的机遇，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也不会一成不变。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事实上，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用新的思想、新的作为、新的精神状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背景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社会虽已步履蹒跚但总体实力尚处于绝对优势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来塑造更加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新关系，同样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用中国实践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用中华文明的复兴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道之所在，义之所当”的伟大实践。伟大的实践要靠伟大的理论来指导，要靠伟大的思想来引领，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更加坚定地革故鼎新、开拓新使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但在新时代如何真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如何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有新作为。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发展新路；以真刀真枪推进改革，不仅改革前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保守做法，还要对在改革过程中已经不合时宜的行为模式再改革，对改革中曾经管用好用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的行为模式再改革。在这方面，我们要大胆地“变”，而且要“大变”“根本变”“全方位变”。我们要正确认识并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顺应“变”，促进“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相关制度体制以及政策设计安排进行适时的调整变革，以“变”应“变”；立足“不变”，守住“不变”，咬定青山不放松，审慎布局、量力而行，继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经济基础。

我国解决之前的社会主要矛盾用了三十多年时间，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恐怕也要差不多这么长的时间。这就是说，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时，当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这一主要矛盾将有望得到切实解决并实现新的转换。

更加豪迈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思跨越。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再到更高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更是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郑重承诺。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实已经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与抱负。不唱高音，不忘前行。只要我们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每时都有新进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定会到来。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研究室主任许涛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是上合组织扩员后召开的首次峰会，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主持上合峰会。回顾上合组织的建立发展，展望青岛峰会开启的上合新征程，人们不难发现，成员国积极实现战略对接为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首先，用共同的发展需求超越差异与分歧。从成立之日起，上合组织就凝聚起成员国最主要的政治共识，推动地区内安全、经济、人文领域的有效务实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恪守被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影响力逐年上升的根本。这一地区性国际合作实践本身既是对零和博弈等错误理念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对构建更加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集体诉求。

其次，用新安全观推动安全领域合作升级换代。安全领域合作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主要合作方向，而且也仍将是近期和未来的工作重心之一。2013年至2017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机构共制止600多起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摧毁500多个武装分子培训基地，抓获2000多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

最后，从改善共同发展环境入手参与全球治理。上合组织成员中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占据了代表新兴经济体的“金砖五国”的五分之三。面对目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出现的重大调整，各成员国对优化发展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有着相近的诉求。作为冷战后出现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上合组织不仅在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通过自身的地区实践，探索出一套区域治理的思路和做法。

“上海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指出：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当今世界所处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进行“把脉”，赋予“上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从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的角度对上合组织发展进行全面提升。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是中国首倡的新发展理念，上合组织要解决发展问题，缩小发展差距，离不开这一发展观指引。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新安全理念，已成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基础。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是上合组织应对经济全球化逆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法宝。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落实“上合精神”、尊重多样文明目标的可靠抓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上合组织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贡献。

光有重器没有“精器”是不行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我们现在大国重器有了，但还没有“精器”。也就是说，肌肉强壮了、骨骼长大了，但是心脏和脑子还要靠别人。这是不行的。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各路科技大军组织起来共同攻关。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到现在的各种大科学工程，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关键核心精密元器件还要从外国引进或者仿制。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我们自己搞。这非一日之功。中国科技正处在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只是在某些领域冒了头，有了一些突破。真正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基础和核心的部分。

为此，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要有韧性和决心解决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对国家的责任感。科技工作者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精力都投入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去，不计名、不计利，真正为国家振兴作出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贡献。